

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的控制权重构研究

杨大龙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100070；

摘要：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公司控制权的分配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本文综合分析了数字经济如何重构公司的控制权分配。文章首先概述了数字经济对企业治理带来的变革，随后深入探讨了权力转移理论，评析了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控制权重构的原因及路径。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的缓解、融资环境的改善、管理决策的优化以及企业主动赋权策略，共同推动了控制权向管理层和创始人的转移。这一转变不仅影响了公司治理的实践，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理解和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治理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数字经济；公司治理；控制权；权力转移；信息不对称

DOI：10.69979/3041-0673.25.10.006

引言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企业治理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标志着企业决策权的重心由传统的股东主导逐渐转向以企业领导者为核心，这些领导者往往对公司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控（陈德球和胡晴，2022）。这一转变强调了人才和技术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权力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首先数字经济时代最大变化就是信息不对称得到了缓解，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将企业治理结构正变得更加网络化，利用信息技术来优化治理流程，形成覆盖广泛的治理网络，以此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其次，数字技术的融入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和高效地获取和配置财务资源。同时，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这改变了企业内部控制权的分配方式，使得那些掌握关键资源和专用技术的人才成为控制权配置的重要依据。第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应用，为企业的管理者治理公司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进行市场分析、风险管理和决策制定。第四，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治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股东和管理层，而是扩展到了包括员工、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内的更广泛群体，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过程。

综上，本文将在厘清公司控制权与权力转移内涵的基础上，对已有实证研究进行梳理与评析，揭示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的控制权重构原因及路径，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1 权力转移理论与公司控制权重构

1.1 权力转移理论

在当代社会，权力的概念已经从传统的资本主导转变为信息主导。权力被定义为一种能力，能够基于内在逻辑影响他人的观点和行为（胡平仁，2024）。要行使权力，个体或集体必须掌握关键的资源。历史上，权力的主要来源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但是，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使其成为权力的一个关键来源（陈德权等，2021）。当前，谁掌握了信息流，谁就拥有了影响力，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决策和行动的能力。

技术权力理论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点，将技术视为一种能够改变人类行为的工具，从而赋予其拥有者权力（王伯鲁，2013）。在现代社会，随着公司广泛采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和设备，它们也相应地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信息的积累不仅增强了决策能力，还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一个人如果能够获取并有效利用大量信息，就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不断提升自我。然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个体必须具备将信息有效转化为知识、技能和创新的能力。

本文将依据权力转移理论，探讨公司控制权的重构过程，分析信息如何成为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梳理在数字化背景下，公司如何通过信息的掌握和应用来优化决策过程，并重新定义权力结构。

1.2 公司控制权重构研究

在步入数字化时代之前，公司控制权主要集中在资本雄厚的股东手中，特别是持有最大股东地位的个人或

实体。这些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有动机通过行使投票权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以保护其财产和确保投资回报。相关研究表明，强化股东权益保护有助于优化投票机制，进而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与约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规范经营决策，改善市场评价，从而提升股东权益的价值（连建辉和傅明华，2002）。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时代的融资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尤其是当股权分散，缺少了单一大股东的控制力时。在这种环境下，公司控制权越来越多地向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团队转移。股东通过投票、股权转让或退出来约束管理层的能力有所下降。公司治理的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转向如何激励管理层，特别是核心技术团队，以确保其持续投入人力资本，从而建立更加平等和互利的合作关系（陈德球和胡晴，2022）。

在数字化浪潮下，企业管理层的职能定位发生了深刻变革。他们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股东代表或董事会执行者角色，转型为企业战略引领者和价值缔造者。即便在持股比例降低的情况下，基于创新驱动机制，管理层仍能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数字科技企业的管理团队凭借其独特的专业壁垒和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使得股东在人才市场上难以获取同等效能的替代人选（于茜和惠宁，2025）。这导致股东相对于管理层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而管理者的专业强势在没有适当权力平衡的情况下，可能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投资决策的精准度和科学性，同时加速了生产效能的优化进程。这使得管理层能够更高效地获取人力资本投入所带来的绩效回报，有效抑制了个人逐利行为，减少了企业资源的低效配置，从而全面提升了组织的运营管理效能。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重塑企业控制权的分配格局。在传统公司治理框架中，股东凭借资本优势掌握主导权，并通过治理机制实现对管理层的有效约束。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已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和创新动能，这使得掌握关键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管理团队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当前的公司治理体系亟需适应这一结构性变革，通过制度创新来平衡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关系，构建更加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新型治理模式。下文将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发展对公司控制权配置产生的具体影响及其重构路

径。

2 数字经济时代对公司控制权重构的推动

2.1 基于信息不对称缓解的控制权重构

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普遍存在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了权力结构的不平衡（李香菊和祝丹枫，2018）。管理层通常掌握着企业的关键信息资源，这种信息的集中使得他们在公司治理中占据优势地位。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股东能够获取的信息量，提高了信息的多样性，从而缓解了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

从生产和运营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引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促进了生产流程的标准化，使得企业运营更加透明，减少了管理层可能的操纵空间，降低了外部监管的成本。数字化工具的广泛应用显著优化了企业的资本配置效能与战略决策质量，有效激发了组织的创新活力，进而强化了市场竞争优势并促进了业务版图的拓展。值得注意的是，当企业经营成果持续改善时，管理团队更倾向于通过提升公司价值来实现个人收益，这种正向激励显著抑制了权力寻租行为和资源错配现象，从而有效缓解了传统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效率损耗问题（陈德球和胡晴，2022）。从信息生态视角来看，大数据技术与数字化平台的蓬勃发展不仅重构了信息采集与分发的底层逻辑，更通过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矩阵的指数级传播效应，使移动终端用户和网络社群演变为影响企业信息披露与外部监督机制的重要参与主体。

在当代公司治理范式与研究框架的深刻变革中，数字经济不仅重构了治理机制的作用维度，更开辟了多元化的治理路径。数据资产作为新型核心生产要素，其市场化培育、基础性资源配置功能以及创新驱动效能的释放，已成为数字化进程中的关键发展命题。依托大数据技术，企业不仅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生产效能的跃升，还能构建对管理层的动态监督体系，有效压缩决策随意性和操作空间，从而推动公司治理效能的全方位提升。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信息传播呈现出渠道多元化与效率倍增的特征，技术革新使得信息传递路径显著缩短（喻国明和马慧，2016）。这一变革使得中小投资者、金融中介机构及网络舆论平台等多元治理主体获得

实质性赋权，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已突破传统线下场景，延伸至数字空间，形成对公司经营行为的立体化监督网络。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商业形态持续演进、行业竞争白热化以及消费者主权意识觉醒，产品市场的治理价值被重新定义。企业需要通过深度用户数据分析构建竞争壁垒，在此过程中，消费群体与产品市场正逐渐成为影响公司治理架构的重要外部力量。

2.2 基于融资环境改善的控制权重构

在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驱动企业经营模式实现质的飞跃。这些技术突破不仅重塑了公司治理的运行逻辑和实施路径，更推动了相关研究范式的系统性革新。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通过持续的迭代演进，不仅构建了全新的商业生态系统和运营范式，更对公司治理的传统架构和方法论进行了根本性重构。

这一技术变革在企业融资领域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发展，通过拓宽融资通道、优化信贷匹配机制以及提供精准的资源对接服务，显著提升了企业融资的社会化程度（陈德球和胡晴，2022）。这一演变弱化了企业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依存度，削弱了股东意志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倚重掌握核心技术和专业能力的创始团队与关键人才。这种权力格局的演变促使公司控制权逐渐向管理层转移，人力资本的价值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创业者的管理智慧与创新能力已然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研究的关键维度。

通过这一转型，公司治理不再仅仅关注股东的利益和偏好，而是更加注重如何通过激励管理层和核心团队，推动企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这种以创新和技术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新模式，正在成为企业适应数字化时代挑战的关键策略。

2.3 基于管理决策优化的控制权重构

数字技术正日益成为管理层优化经营决策的得力助手。通过精确的投资决策，企业能够高效地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表现，这样的成果又能直接转化为管理层的薪酬奖励，从而降低管理层可能追求私利的动机，减少

因个人利益导致的资源浪费和代理成本。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演进，企业治理中传统的股东-管理层委托代理关系正经历着深刻转型。在此背景下，治理机制设计的核心命题已转向双重目标：既要保障创始团队控制权的持续稳定，又要构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更加协同共生的新型合作关系。这种转变意味着公司治理的研究范式正在经历从“股东中心”向“企业家中心”的过渡。

在这一转型后的治理框架中，企业治理的核心诉求发生了本质性演变。其关注重点已从单一追求股东物质资本收益最大化，转向更加重视企业家才能和创新要素的价值创造功能，以及这些核心能力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键驱动作用。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来源。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和政策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以确保能够充分激发和利用这些关键资源，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创新。

2.4 基于企业主动赋权的控制权重构

在企业运营中，尽管股东们掌握着资本优势，但他们在管理实践方面可能并不具备同等的专业能力。面对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为了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往往需要依靠具有专业管理知识和技能团队来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石晓军和王骞然，2017）。因此，一些企业开始采取策略性的转变，通过赋予管理层更多的决策权，来促进控制权的转移，这反映了一种适应时代变化的治理策略。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能否有效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以及是否具备深厚的管理知识和实践经验，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至关重要。这些能力往往是企业创始人和管理层所具备的，而股东可能在这些专业领域相对欠缺。随着专业化在现代企业治理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股东们逐渐意识到，为了企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需要将更多的管理权力交给那些具备专业能力的管理层（梁权熙和曾海舰，2016）。

这种趋势表明，企业的治理结构正在经历一种由内而外的变化，从传统的以股东为中心向以管理层为中心的模式转变。股东的角色逐渐从直接的经营管理者转变为战略投资者，他们更专注于监督和支持管理层的决策，而非直接介入日常经营活动。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管理层的专业技能，推动企业的创新和增长，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3 结语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公司控制权的重构机制,揭示了企业治理范式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革。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权力分配格局,更重塑了企业价值创造的底层逻辑。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治理正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控制权配置的核心要素发生了本质转变。传统以物质资本为主导的治理模式正在被“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的新型结构所替代。管理层和创始人凭借其对关键技术、数据资产和创新能力的掌控,逐渐成为企业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决策主体。这一转变使得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从财务资本转向了知识资本和创新动能。

其次,数字经济重构了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显著改善了信息环境,通过四种路径优化了治理效能:一是缓解信息不对称,构建了更透明的治理生态;二是拓展融资渠道,降低了资本供给的集中度;三是赋能管理决策,提升了战略制定的科学性;四是增加企业对专业管理团队的依赖。这些变革共同推动了控制权从股东向专业管理团队的转移。

展望未来,公司治理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深化探索:其一,应关注控制权动态配置的平衡机制,既要保障专业管理团队的决策自主性,又要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代理风险;其二,需加强数字经济环境下新型治理工具的创新研究,如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治理、数据资产的确权与分配机制等;其三,应重视跨国比较研究,探索不同制度环境下数字技术对治理结构影响的差异性。

实践层面,企业需要构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治理创新体系:一方面要完善管理层长效激励机制,将创新绩效与控制权配置动态挂钩;另一方面要建立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同治理平台,实现决策科学性与包容性的统一。同时,监管机构应当及时调整公司治理规范,为数字时代的治理创新提供制度空间。

参考文献

- [1]梁权熙,曾海舰.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股价崩盘风险[J].管理世界,2016,(03):144-159.
- [2]石晓军,王骞然.独特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自互联网公司双层股权制的全球证据[J].经济研究,2017,52(01):149-164.
- [3]陈德球,胡晴.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公司治理研究:范式创新与实践前沿[J].管理世界,2022,38(06):213-240.
- [4]连建辉,傅明华.代理权争夺与公司治理[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34-38+50.
- [5]陈德权,朱鑫,周倩.从信息公开到数据开放的历史演变与逻辑阐释——基于权力转移理论的视角[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23(06):69-77.
- [6]胡平仁.权力概念的法学巡礼[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4,42(04):18-35.
- [7]王伯鲁.技术权力问题解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30(06):41-45.
- [8]于茜,惠宁.专精特新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学家,2025,(04):46-56.
- [9]李香菊,祝丹枫.财税政策波动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冲突视角的分析[J].财贸研究,2018,29(11):15-30.
- [10]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J].国际新闻界,2016,38(10):6-27.

作者简介:杨大龙(2000—),男,汉族,四川宜宾人,硕士在读,管理学硕士,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